

## 尊杜與貶杜—— 論陸時雍與王夫之的杜詩選評

陳美朱\*

### 摘 要

陸時雍(?-?)的《唐詩鏡》及王夫之(1619-1692)的《唐詩評選》，都是明清之際有名的唐詩選本，選本中杜甫詩的入選量也都高居首位，七律的成就更是遠邁有唐其他詩家。如果選本是選家批評意識的延伸，反映出選家編選的標準與態度，陸、王兩家唐詩選本的杜詩選錄數量高居第一，應寓有推尊杜詩之意，但令人不解的是，陸、王兩家評論杜詩時，卻經常出現負面意見，如陸時雍曾言：「心托少陵之藩而欲追風雅之奧，豈可得哉？」王夫之甚且有「風雅罪魁，非杜其誰邪？」之言，如果杜詩並非兩人心目中真正推崇的唐詩典範，那麼唐詩選本中選錄最多的意義何在？

學界目前對於上述的詩學矛盾現象，多著眼於兩家「如何」貶杜以及「何以」貶杜，卻往往忽略陸時雍、王夫之在「貶杜」之餘，杜詩卻也是兩家唐詩選本中選錄最多的事實。本文遂擬在前人研究基礎上，針對陸、王兩家「貶杜」與「尊杜」之間的矛盾現象進行爬梳，尤其是兩家唐詩選本何以選錄杜詩最多的深意，期能對兩家的詩論及兩家所選出的杜詩樣貌，有更周全的觀照與思考。

關鍵詞：陸時雍、王夫之、杜詩、唐詩評選、唐詩鏡

---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 Appreciations and Criticisms of Du Fu's Poems: A Study on Lu Shiyong and Wang Fuzhi's Selected Anthologies of Du's Poems

Chen Mei-Ch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 Abstract

Wang Fuzhi's *The Anthology of Tang Poetry* and Lu Shiyong's *Tangshi Jing* (A Mirror of Tang Poetry) are two anthologies which were widely know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ithin these two anthologies, the compilers select a great amount of Du Fu's poems, which means the two compilers highly valued the literary prowess in Du Fu's poetry, an evaluation which reflects their literary standards and judgments. However, negative commentary frequently appears in these two anthologies; commentaries even argue that Du Fu may have ruined poetic arts. Thus, why had they anthologized such a great amount of Du Fu's poems if they did not regard Du's poems as the paragon of Tang poetry?

Currently, the phenomenon mentioned above has been discussed in academia, yet scholars are merely inclined to study how and why Du Fu's poems were depreciated and ignored the main point: that Du's poems were heavily anthologized compared to other Tang poets. This study is built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studies to probe further into this problem, to establish Lu and Wang's reasoning for anthologizing Du's poems.

**Keywords:** Lu Shiyong, Wang Fuzhi, Du Fu's poetry, *Anthology of Tang Poetry*, *Tangshi Jing*

# 尊杜與貶杜—— 論陸時雍與王夫之的杜詩選評<sup>1</sup>

陳美朱

## 一、前言

本文以陸時雍及王夫之的杜詩選評為討論對象，乃有見於兩人皆處於明清之際，並皆有唐詩選本問世，選本中也以杜詩的選錄數量高居首位，遠邁有唐其他詩家。但令人不解的是，選本既然是出於選家的擇錄篩選，當可視為選家批評意識的延伸，反映出選家編選的標準與態度，因此，詩歌選本中選錄杜詩數量高居唐人第一，應寓有對杜詩的推尊之意，何以陸、王兩家評論杜詩時，卻又經常出現負面意見，如陸時雍曾言：「心托少陵之藩而欲追風雅之奧，豈可得哉？」<sup>2</sup>王夫之甚且有「風雅罪魁，非杜其誰邪？」<sup>3</sup>之言，如果杜詩並非兩人心目中真正推崇的唐詩典範，那麼唐詩選本中選錄最多的意義何在？這種同時兼具「尊杜」與「貶杜」的詩學矛盾，在杜詩學史上是頗值得探究的。<sup>4</sup>

學界目前對於陸、王兩家對杜詩評論的探討，多著眼於兩家「如何」貶杜以及「何以」貶杜（詳見下述），但往往忽略陸時雍、王夫之在「貶杜」之餘，杜詩卻也是兩家唐詩選本中選錄最多的事實。本文遂擬在前人研究基礎上，針對陸、王兩家

---

<sup>1</sup> 本文承蒙國科會 100 年度計畫案（NSC100-2410-H-029-030-）補助，謹此致謝。

<sup>2</sup> 明·陸時雍：《古詩鏡·詩鏡總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63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20。

<sup>3</sup> 清·王夫之著，陳新校點：《明詩評選》（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卷 5，頁 243，徐渭〈嚴先生祠〉後評。

<sup>4</sup> 大陸學者鄔國平、葉佳聲研究指出：「尊杜和貶杜二種相反的傾向都同時突出地存在於一個批評家身上，這在杜詩學史上還是比較少見的。」詳見氏著：〈王夫之評杜甫論〉，《杜甫研究學刊》1（2001），頁 56。

「貶杜」與「尊杜」之間的矛盾現象進行爬梳，尤其是兩家唐詩選本何以選錄杜詩最多的深意，期能對兩家的詩論及兩家所選出的杜詩樣貌，有更周全的觀照與思考。

## 二、陸時雍、王夫之選杜與評杜的矛盾現象

陸時雍（?-?），字仲昭，浙江桐鄉人，崇禎 6 年（1633）貢生，終生未仕，著有《楚辭疏》及《詩鏡》。其中《詩鏡》一書，含《古詩鏡》36 卷，《唐詩鏡》54 卷。選錄漢魏至晚唐詩，書中含詩人小傳、詩選及詩評三部分，《古詩鏡》卷前並有〈詩鏡總論〉一篇。《四庫全書總目》謂其論詩「大旨以神韻為宗，情境為主」，並稱許本書「採摭精審，評釋詳核，凡運會升降，一一皆可考見其源流，在明末諸選中固不可不謂之善本矣。」<sup>5</sup>據此可概知本書的要旨與評價。

王夫之（1619-1692），字而農，號薑齋，湖南衡陽人。崇禎 15 年（1642）曾在衡山組織抗清起義，戰敗後曾短暫任職於南明桂王朝，桂林陷落後遂決心隱遁，晚年屏居衡陽石船山，學者稱船山先生，為明清之際著名的思想家與文學家，一生著述宏富，後人編為《船山遺書》324 卷。其詩歌選評之作計有《古詩評選》6 卷、《唐詩評選》4 選及《明詩評選》8 卷。

理解了陸時雍與王夫之的生平與學術背景後，緊接比較兩家唐詩選本中選錄杜詩的情形。

以詩作的入選數量而言，陸時雍《唐詩鏡》選錄杜甫各體詩作共 372 首<sup>6</sup>，與書中選錄數量前五名的其他四位詩家相較，分別是李白 295 首，白居易 193 首，元稹 121 首，王維 96 首，可見杜詩在該書入選數量的超越性。

相較於陸時雍「按詩家所處時代先後順序排列，再就詩家作品分體選詩」的體

<sup>5</sup> 清·紀昀等著：《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189，頁 69，集部總集類四〈古詩鏡三十六卷唐詩鏡五十四卷〉條下。

<sup>6</sup> 《唐詩鏡》選錄杜詩各體數量，詳細可參見羅安伶：《陸時雍〈唐詩鏡〉之詩學理論研究》（臺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頁 32-33。

例，王夫之《唐詩評選》則是採「先詩體後詩家」的方式，書中共分 4 卷，分別是卷 1「樂府歌行」，卷 2「五言古」，卷 3「五言律」，卷 4「七言律」。全書共選錄杜詩 91 首，為書中選錄數量數多的詩人，與選錄數量較多的前四名詩家相較，依序是李白 43 首，王維 25 首，岑參 18 首，韋應物 18 首。儘管王夫之《唐詩評選》未選錄絕句一體，可能影響詩家的入選數量，但由於杜甫詩的入選量比李白多了 48 首，甚至超過李詩入選量的 43 首，誠如鄔國平、葉佳聲論文所言：「即使將絕句的因素考慮進去，也不可能改變杜甫詩在《唐詩評選》中位居榜首的局面。」<sup>7</sup>

今人陳國球先生論及詩歌選本的批評意義時指出：「幾乎所有批評家都認為自己就是最有識力的人，但除非身兼選家的身份，他們多半不會將經自己識力判別的一套文學正典一一羅列，可能他們根本也沒有一張詳細的清單。然而，如果有一些大家都注意選本出現，批評家要印證識力，就較為容易。無論從篇章的取捨、體例的安排，以至選詩的宗旨及相關的文學觀念，都可以斟酌指點，表示認同或作出異議。」<sup>8</sup>既然詩歌選本是詩評家擇錄篩選的結果，也是其用以宣揚詩學主張的手段，透過選本中所選錄的詩家與選詩數量多寡，當不難理解詩評家的詩學好惡取向。然而，在研閱陸時雍《唐詩鏡》與王夫之《唐詩評選》時，卻經常可見「選」與「評」之間的巨大反差。

以陸時雍而言，陸時雍在〈詩鏡總論〉主張：「中唐人用意好刻好苦，好異好詳」，相形之下，「盛唐人寄趣在有無之間，可言處常留不盡，又似合於風人之旨，乃知盛唐人之地位故優也。」<sup>9</sup>但比對《唐詩鏡》的選詩內容，中唐詩共選錄 1258 首，詩家 95 人，盛唐詩則選錄 1112 首，共 62 人，明顯與「盛唐人之地位故優」的論點不合。再以「七古」一體而言，陸時雍宣揚李白的七古是「千古之雄」，理由是「氣駿而逸，法老而奇，音越而長，調高而卓」，相形之下，「少陵何事得與執金鼓而抗顏行也？」<sup>10</sup>評李白〈駕去溫泉宮後贈楊山人〉詩，再度稱許李白七古「雄情逸調，

<sup>7</sup> 上述論點，參見鄔國平、葉佳聲：〈王夫之評杜甫論〉，頁 55。

<sup>8</sup> 陳國球：《明代復古詩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第四章〈從《唐詩品匯》到李攀龍選唐詩〉，頁 217。

<sup>9</sup> 明·陸時雍：《古詩鏡·詩鏡總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637 冊，頁 23。

<sup>10</sup> 明·陸時雍：《古詩鏡·詩鏡總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637 冊，頁 18。

縱自天成」，隨後不忘貶低杜甫以為陪襯：「杜子美氣勢雄沈而語多滯色，以稱敵手，未也。」<sup>11</sup>但《唐詩鏡》選錄杜甫七古 94 首，李白僅 53 首，就算將七言樂府 58 首併入計算，杜甫的 94 首與李白的 111 首也相去不遠，絕對是堪稱敵手。

令人玩味的是，陸時雍不僅在選評李白、王維詩作時，借杜甫以為陪襯，藉此抬高李、王兩家的地位，在杜甫小傳之後總評杜詩時，雖也高度肯定杜甫古、近體詩的成就，所謂：

五、七古詩，雄視一世，奇正雅俗，稱題而出，各盡所長，是謂武庫；五、七律詩，他人每以情景相和而成，本色不足者，往往景饒情乏，子美直據本懷，借景入情，點鎔成相，最為老手。<sup>12</sup>

由「雄視一世」與「最為老手」等語詞來看，杜甫的五、七言古詩和律詩，似乎仍是有唐詩家第一人，但陸時雍緊接著口氣一轉，在區分李白、王維、杜甫三家的特色與高下時主張：

王摩詰之清微，李太白之高妙，杜子美之雄渾，三者並稱，然而太白之地優矣。<sup>13</sup>

這種「太白之地優矣」的評論，如果是出現在《唐詩鏡》李白詩卷中，尚可理解為「借客陪主、推尊傳主」之意，但在杜甫詩卷中推尊李白，難免予人「喧賓奪主、賓主易位」的印象。類似的評論還不止此，如杜甫〈無家別〉後評有：「老杜詩必窮工極苦，使無餘境乃已，李青蓮只指點大意。」<sup>14</sup>之言，表面上李、杜兩家似乎各有所長，實則不然，杜詩的「窮工極苦，使無餘境」，在陸時雍的詩論體系中也是屬於負面評價，由卷前〈詩鏡總論〉以下所言，可印證不誣：

世之言詩者，好大、好高、好奇、好異，此世俗之魔見，非詩道之正傳也。<sup>15</sup>

優柔悱惻，詩教也，取其足以感人已矣。後之言詩者，欲高、欲大、欲奇、欲

<sup>11</sup> 明·陸時雍：《唐詩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637 冊，卷 19，頁 4。

<sup>12</sup> 明·陸時雍：《唐詩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637 冊，卷 21，頁 1。

<sup>13</sup> 明·陸時雍：《唐詩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637 冊，卷 21，頁 1。

<sup>14</sup> 明·陸時雍：《唐詩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637 冊，卷 21，頁 6。

<sup>15</sup> 明·陸時雍：《古詩鏡·詩鏡總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637 冊，頁 15。

異，於是遠想以撰之，雜事以羅之，長韻以屬之，倣詭以炫之，則駢指矣。此少陵誤世，而昌黎復誦其波也。心托少陵之藩而欲追風雅之奧，豈可得哉？<sup>16</sup>

在陸時雍看來，過分追求「高、大、奇、異」，皆有違「優柔悱惻」、「足以感人已矣」的詩教，而杜詩的「窮工極苦，使無餘境」，正是其貽誤後世者，〈詩鏡總論〉遂又調杜詩「五、七言古窮工極巧，調無遺恨，細觀之，覺幾回不得自在。」<sup>17</sup>相形之下，李白「指點大意」的詩評，自然要比杜甫的「窮盡無餘」更勝一籌。

令人不解的是，陸時雍既然指出杜詩有以上種種不足之處，以致後人「心托少陵之藩而欲追風雅之奧，豈可得哉？」然則陸時雍在編選《唐詩鏡》時，何以杜甫被選錄的詩作仍是最多，而不是「指點大意」的李白？或是「離象得神，披情著性，後之作者誰能之」<sup>18</sup>的王維呢？這是陸時雍《唐詩鏡》所存在的「選」與「評」之間的重大矛盾現象。

至於王夫之對杜詩的負面評論，學界目前不乏相關主題的論文，如大陸學者郭瑞林在〈千古少有的偏見——王夫之眼中的杜甫其人其詩〉<sup>19</sup>一文中，針對王夫之如何「貶抑杜甫的人品」及「貶損杜詩的成就」加以論述，其後並就王夫之「貶抑杜甫與杜詩的原因」加以探討，認為主要的原因有三，其一是杜詩有悖風雅傳統，其二是王夫之論詩有厚古薄今傾向，其三是王夫之論詩有重漢魏輕唐宋的傾向。而鄔國平、葉佳聲〈王夫之評杜甫論〉一文，則結合王夫之「以平為貴」的詩學主張，認為王夫之評杜詩有「尊兩頭」（即入蜀前、出峽後）貶中間（在蜀時期）的傾向，並突出杜詩閒雅深婉而有神行之妙的一面，「實際上是抑奇求平的詩歌藝術的反映」；此外，王夫之從詩、史之別批評杜詩，乃是「王夫之對楊慎的詩歌評價甚高，在詩史問題也基本接受了楊慎的看法。」<sup>20</sup>上述論點，筆者並無異議，但依舊不能

<sup>16</sup> 明·陸時雍：《古詩鏡·詩鏡總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637 冊，頁 20。

<sup>17</sup> 明·陸時雍：《古詩鏡·詩鏡總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637 冊，頁 20。

<sup>18</sup> 明·陸時雍：《古詩鏡·詩鏡總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637 冊，頁 15。

<sup>19</sup> 郭瑞林：〈千古少有的偏見——王夫之眼中的杜甫其人其詩〉，《湘潭師範學院學報》21：4（2000.07），頁 82-87。

<sup>20</sup> 鄔國平、葉佳聲：〈王夫之評杜甫論〉，頁 58。

不有疑的問題是：倘若杜詩真如王夫之所謂是「風雅罪魁」<sup>21</sup>，是「取驚俗目」<sup>22</sup>的話，那麼該如何解釋王夫之《唐詩評選》中選錄杜詩最多的意義？此外，王夫之論李、杜二家時，對李白只褒不貶，對杜詩則頗多微詞，但選本中的杜詩總數（91 首）仍是李詩（43 首）的兩倍以上<sup>23</sup>，又該如何看待此一矛盾現象？

為能深入探究陸、王兩家「對杜詩多有貶抑之詞，但杜詩卻是唐詩選本中選錄最多」的矛盾現象，以下將就兩家選杜最多的緣由分別進行探討。

### 三、陸時雍《唐詩鏡》選杜最多的緣由

《四庫全書總目》論陸時雍詩學，謂其「大旨以神韻為宗，情境為主」，但筆者以為，在「神韻」與「情境」之外，「中和之則」更是陸時雍詩論中不可忽視的要點。

所謂「中和之則」，見於〈詩鏡總論〉論杜詩，其云：

杜少陵〈懷李白〉五古，其曲中之悽調乎？苦意摹情，過於悲而失雅。〈石壕吏〉、〈垂老別〉諸篇，窮工造景，逼於險而不括，二者皆非中和之則。<sup>24</sup>

由「過悲」則「失雅」，「逼於險」則「不括」，可見「中和之則」強調的是不偏不倚，不過分偏向某種情態或風格；再由四庫館臣於《詩鏡》提要中引用陸時雍〈詩鏡總論〉的兩則詩論內容來看：

氣太重，意太深，聲太宏，色太厲，佳而不佳，反以此病。<sup>25</sup>

詩不患無材，而患材之揚；不患無情，而患情之肆；不患無言，而患言之盡；

<sup>21</sup> 清·王夫之著，陳新校點：《明詩評選》，卷 5，頁 243，徐渭〈嚴先生祠〉後評。

<sup>22</sup> 清·王夫之著，任慧點校：《唐詩評選》（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8），卷 3，頁 139，〈漫成〉後評。

<sup>23</sup> 以上論點，大陸學者涂波曾提出疑問，並自言將另撰文探討。但截至目前為止，筆者搜尋大陸期刊網單篇論文，並未得見其探討之專文。參見涂波：〈論王夫之選本批評〉，《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38：4（2005.07），頁 54。

<sup>24</sup> 明·陸時雍：《古詩鏡·詩鏡總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637 冊，頁 17。

<sup>25</sup> 明·陸時雍：《古詩鏡·詩鏡總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637 冊，頁 15。

不患無景，而患景之煩。<sup>26</sup>

引文的共通點都在於強調：詩作不可太過，如太重、太深、太宏、太厲，或是過於揚材、肆情、盡言、煩景，反致詩病。而〈詩鏡總論〉中更是屢屢可見「詩之所病者，在過求之也」、「每事過求，則當前妙境，忽而不領」<sup>27</sup>之言。再對照〈詩鏡總論〉以下所謂：

世之言詩者，好大、好高、好奇、好異，此世俗之魔見，非詩道之正傳也。<sup>28</sup>

凡好大、好高、好雄、好辯，皆才為之累也。善用才者，常留其不盡。<sup>29</sup>

上述論點，又常見於詩作的相關評論，如謂「中唐人用意好刻、好苦、好異、好詳」，相形之下，「盛唐人寄趣在有無之間，可言處常不盡」，此所以「盛唐人之地位故優也」<sup>30</sup>；又如評王維〈送平澹然判官〉，三、四句（黃雲斷春色，畫角起邊愁）佳處在於「意象深露，自然入妙」，陸時雍隨後再度批評為詩「過求」之弊：

若刻之使深，逼之使露，則有傷根動窟之病，縱有佳句，精彩薄而氣象淺矣。<sup>31</sup>

既然「過求」易使詩作刻露、傷根，如何在左右兩端取得平衡，便是「中和之則」的要點所在。

在陸時雍的詩學理論中，這種不偏不倚、相反相成的中和之則，可說是其評定詩作高下優劣的重要指標，試觀《唐詩鏡》以下所言：

余嘗論大家法門，能閒而整，能寬而密，能淡而旨，能簡而奧，能無心而舉會，能不言而自至，能詳而不煩，能嚴而不迫。是故華而不靡，質而不俚。<sup>32</sup>

上述「閒而整」、「寬而密」、「淡而旨」、「簡而奧」、「詳而不煩」、「嚴而不迫」、「華

<sup>26</sup> 明·陸時雍：《古詩鏡·詩鏡總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637冊，頁17。

<sup>27</sup> 兩則引文，俱見明·陸時雍：《古詩鏡·詩鏡總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637冊，頁22。

<sup>28</sup> 明·陸時雍：《古詩鏡·詩鏡總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637冊，頁15。

<sup>29</sup> 明·陸時雍：《古詩鏡·詩鏡總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637冊，頁28。

<sup>30</sup> 明·陸時雍：《古詩鏡·詩鏡總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637冊，頁23。

<sup>31</sup> 明·陸時雍：《唐詩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637冊，卷10，頁12。

<sup>32</sup> 明·陸時雍：《唐詩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637冊，卷18，頁23。

而不靡」、「質而不俚」等諸多概念的提出，都是強調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由「中和之則」來檢驗陸時雍對杜詩的相關評論，吾人不難發現，陸時雍《唐詩鏡》所選錄的杜詩，實兼具正、負兩種評論，為方便檢閱比對，茲以表格條列如下：

表一：陸時雍《唐詩鏡》對杜詩的正、負評價要點

| 有過求之嫌的負面評論                             | 合乎中和之則的正面評論                             |
|----------------------------------------|-----------------------------------------|
| 〈無家別〉：窮工極苦（卷 21 頁 6）                   | 〈發秦州〉：元氣濛濛（卷 22 頁 1）                    |
| 〈玉華宮〉：迫露之極（卷 21 頁 18）                  | 〈鐵堂峽〉：語語深貼有味（卷 22 頁 2）                  |
| 〈北征〉：著色太濃（卷 21 頁 23）                   | 〈石龕〉：氣局最寬，語致最簡（卷 22 頁 3）                |
| 〈鹽井〉：語多險僻（卷 22 頁 3）                    | 〈成都府〉：氣韻高雅，意象更入微茫（卷 22 頁 9）             |
| 〈麗人行〉：墨氣太重（卷 23 頁 3）                   | 〈除草〉：芟盡蕪穢，神趣蔚然，遂臻大雅（卷 22 頁 17）          |
| 〈樂遊園歌〉：往往費力（卷 23 頁 4）                  | 〈谿漲〉：如此正好，過此則生病矣（卷 22 頁 20）             |
| 〈寄韓諫議〉：玉京群帝一段是老人拉掇語，絕非佳處（卷 23 頁 16）    | 〈牽牛織女〉：茫茫落落，是最佳處（卷 22 頁 21）             |
|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好作奇語，亦是一病（卷 23 頁 17）  | 〈王兵馬使二角鷹〉：分外餘思，分外餘力，是此老真奇處（卷 24 頁 6）    |
| 〈荊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氣質太重，往往好盡所長（卷 24 頁 6） |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其最佳處在有而不盡（卷 24 頁 14）         |
| 〈上兜率寺〉：余不知詩家要高大語何用？（卷 25 頁 7）          | 〈春宿左省〉：氣格渾成（卷 25 頁 1）                   |
| 〈登樓〉：空頭且帶俚氣（卷 26 頁 13）                 | 〈曲江二首之一〉：顛倒縱橫，復體格森然，更得自在，所以為難（卷 26 頁 3） |
| 〈閣夜〉：意盡無餘（卷 26 頁 23）                   | 〈院中晚清懷西郭茅舍〉：意卻渾然，此老擅長獨得處（卷 26 頁 6）      |

以上表格中，凡有「過求」之嫌者，多具有「窮、極、大、太、盡、無餘」之意，而合乎「中正之則」的評語，而則多用「渾、茫、有餘」等字眼，或是如〈石龕〉、〈谿漲〉、〈曲江〉般，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從這個角度來說，杜詩儼然是陸時雍論證「中和之則」的最佳例證。一方面，杜詩既有負面的詩例，可用以說明「過求」的負面效應；另一方面，又有合乎「中和之則」者，可引以為讀者的學習典範。

因此，陸時雍對於杜詩固然多有負面評語，甚至有「心托少陵之藩而欲追風雅

之奧，豈可得哉」<sup>33</sup>之言，但並非主張杜詩不可學，而是針對杜詩的「高大奇異」而發，這點除了在〈詩鏡總論〉中屢見其謂「少陵精矣、刻矣、高矣、卓矣、然而未齊於古人者，以意勝也。」<sup>34</sup>「子美之病，在於好奇，作意好奇，則於天然之致遠矣。」<sup>34</sup>的論點外，更不時可見其借題發揮、長篇議論者，例如：

〈登樓〉後評：凡說豪、說霸、說高、說大、說奇、說怪，皆非本色，皆來人憎。<sup>35</sup>

〈上兜率寺〉後評：余不知詩家要高大語何用？物有長短，情有淺深，所為隨物賦形，隨事盡情，如是足矣。今如以巨無霸之衣而加之子都，其謂誇乎？為此者，非腐則俚耳。嘗見孔門論事，未嘗以堯舜驚人，以是知其不必也。<sup>36</sup>

〈赤谷〉後評：老杜發秦州一段，詩正入細，所以首首可誦。凡好高、好奇，便與物情相遠。人到歷鍊，既深事理，知向高、奇，一無用處。<sup>37</sup>

至於杜詩為後人稱頌的名詩名句，常見陸時雍以「卷末附錄」的方式處理，對詩作的評語更是多有鄙薄，如〈登岳陽樓〉之「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陸時雍直言：「自宋人推尊至今六、七百年矣，今直不解其趣。」<sup>38</sup>又如〈江亭〉之「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陸時雍也謂其「家數最小」，相形之下，王維「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二句則「如在層霄之上」<sup>39</sup>；評〈旅夜書懷〉之「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二句為「寡趣，稍近於呆」<sup>40</sup>。至於七律卷末附錄所收〈閣夜〉詩，三、四句之「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陸時雍也評以「意盡無餘」<sup>41</sup>；而〈秋興〉八首更是全部打入附錄中，理由是：「〈秋興〉八首，語氣鄭重，非其至佳之作。」

<sup>33</sup> 明·陸時雍：《古詩鏡·詩鏡總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637冊，頁20。

<sup>34</sup> 兩則引文，分見明·陸時雍：《古詩鏡·詩鏡總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637冊，頁15、20。

<sup>35</sup> 明·陸時雍：《唐詩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637冊，卷26，頁13。

<sup>36</sup> 明·陸時雍：《唐詩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637冊，卷25，頁7。

<sup>37</sup> 明·陸時雍：《唐詩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637冊，卷22，頁2。

<sup>38</sup> 明·陸時雍：《唐詩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637冊，卷25，頁19。

<sup>39</sup> 明·陸時雍：《唐詩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637冊，卷25，頁19。

<sup>40</sup> 明·陸時雍：《唐詩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637冊，卷25，頁20。

<sup>41</sup> 明·陸時雍：《唐詩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637冊，卷26，頁22。

人有調正愛其重，自來風雅騷歌，未見有重者。」<sup>42</sup>凡此種種，都可視為陸時雍對後人學杜之「高大奇異」所作的反省與批判。

與《唐詩鏡》選錄的前五名的詩家相較，更可凸顯陸時雍確實以杜詩作為兼具「中和之則」的正、反例證。檢閱《唐詩鏡》對李白詩作的評論，或言：「嘗謂大雅之道有三：淡、簡、溫。每讀太白詩，深得此致。」<sup>43</sup>或言其「無意無色，自然高妙」<sup>44</sup>，或以之為「大家法門」<sup>45</sup>。即使評語間有涉及「奇」字者，如謂〈蜀道難〉「近賦體，魁梧奇譎，知是偉人」<sup>46</sup>；或謂〈勞勞亭歌〉：「不必他奇，氣格聲調，高視一世。」<sup>47</sup>但句中的「奇」字，實都屬正面肯定之意，而非負面貶抑之詞。至於選詩量居第三、第四的白居易、元稹，其雖有：「元、白言情，元粘白解；遣意鑄詞，元修白率。體裁冗塌則均。」<sup>48</sup>之言，在評論元稹詩作時，也偶見「淺近」、「率而盡」<sup>49</sup>等言，但整體來說，仍以「淺而旨」、「足語有味」、「淡而旨」<sup>50</sup>這類正面的評語居多。至於王維的選詩量雖位居《唐詩鏡》第五，但陸時雍評論王維詩作時，明顯有「揚王抑杜」之嫌，如謂「摩詰七律與杜少陵爭馳」<sup>51</sup>，或謂其七律「標格渾成，意象圓美，恐杜少陵不得擅美於唐」<sup>52</sup>，甚至還為王維抱屈，以為「後人因絕愛少陵，遂至忽視摩詰」<sup>53</sup>，選本中的評語，也多為「語淺情深」、「悠然自遠」、

42 明·陸時雍：《唐詩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637 冊，卷 26，頁 23。

43 明·陸時雍：《唐詩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637 冊，卷 17，頁 7，李白〈春思〉後評。

44 明·陸時雍：《唐詩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637 冊，卷 20，頁 15，李白〈蘇台覽古〉後評。

45 明·陸時雍：《唐詩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637 冊，卷 18，頁 23，〈采蓮曲〉後評。

46 明·陸時雍：《唐詩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637 冊，卷 18，頁 3。

47 明·陸時雍：《唐詩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637 冊，卷 19，頁 9。

48 明·陸時雍：《唐詩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637 冊，卷 42，頁 1，〈白居易〉卷前小傳後附總評。

49 明·陸時雍：《唐詩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637 冊，卷 46，頁 1，元稹〈君莫非〉後評；頁 4，〈茅舍〉後評。

50 明·陸時雍：《唐詩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637 冊，卷 42，頁 6，〈冬日早起閒詠〉後評；頁 6〈宿東亭曉興〉後評；頁 7，〈西原晚望〉後評。

51 明·陸時雍：《唐詩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637 冊，卷 10，頁 18，王維〈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應制〉後評。

52 明·陸時雍：《唐詩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637 冊，卷 10，頁 20，〈出塞作〉後評。

53 明·陸時雍：《唐詩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637 冊，卷 10，頁 22，〈酌酒與裴迪〉後

「語語領趣」、「語雖淺淺，卻有真趣」<sup>54</sup>這類正面肯定詞彙。相較於四家僅有正面示範意義的情況下，陸時雍對杜詩的評語，實兼具負面的「過求」與正面「中和之則」的內容，既援引杜詩的高大好奇以為詩病，又以杜詩語意渾然、有餘不盡者作為學習典範，此當為杜詩所以在《唐詩鏡》中選錄最多的主要緣由。

#### 四、王夫之《唐詩評選》選杜最多的緣由

相較於陸時雍《唐詩鏡》對選錄的杜詩有正、反兩種評價，王夫之《唐詩評選》對杜詩的評論，除了少部分不得不留的詩作略帶貶意，其餘多為正面評價，其對杜詩的負面評價，則集中在《古詩評選》與《明詩評選》論述詩家「學杜」的相關議題上。

翻閱《明詩評選》，屢見王夫之以「某人詩非由學杜得來」作為評論。如評袁凱詩云：「李獻吉謂凱詩學杜，非也，凱詩正自沈約來。」其後不忘將袁凱自「學杜」的行列切割開來，以為：「此章純無筆墨痕，學杜者何足以及之。」<sup>55</sup>評張元凱詩則云：「杜學盛行之日，此公卻問道岑嘉州，故於歌行尤宜，不屑作『老夫清晨梳白頭』詩也。」<sup>56</sup>評徐渭〈楊妃春睡圖〉，稱許其「不似杜子美〈王宰〉、〈曹霸〉諸篇有痕。」<sup>57</sup>評貝瓊詩，也有：「必不可謂此為仿杜」，因為「仿杜者必多一番削骨稱雄，破喉取響之病。」<sup>58</sup>評王逢詩則云：「純靜無折疊紋，固不可與學杜人同傳。」<sup>59</sup>評高啟詩云：「苦學杜人必不得杜，唯此奪杜胎舍，必不從〈夔府詩〉入手也。」<sup>60</sup>評張宇初詩亦

評。

<sup>54</sup> 以上四則評語，參見明·陸時雍：《唐詩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637冊，卷10，頁2，〈贈裴迪〉後評、〈送別〉後評；頁4，〈藍田山石門精舍〉後評、〈崔濮陽兄季重前山興〉後評。

<sup>55</sup> 清·王夫之著，陳新校點：《明詩評選》，卷1，頁10，〈雞鳴〉後評。

<sup>56</sup> 清·王夫之著，陳新校點：《明詩評選》，卷2，頁57，〈新豐主人〉後評。

<sup>57</sup> 清·王夫之著，陳新校點：《明詩評選》，卷2，頁60。

<sup>58</sup> 清·王夫之著，陳新校點：《明詩評選》，卷6，頁281，〈庚戌九日是日聞蟬〉後評。

<sup>59</sup> 清·王夫之著，陳新校點：《明詩評選》，卷5，頁170，〈奉寄趙伯器參政尹時中員外五十韻〉後評。

<sup>60</sup> 清·王夫之著，陳新校點：《明詩評選》，卷5，頁186，〈郊野雜賦〉四首之一後評。

云：「非杜不能，正不從杜得。」<sup>61</sup>評蔡羽詩作時，更引用蔡羽「少陵不足法」之言，再三稱許其「能不學杜，即可問道。……先生解云杜不足法，故知滿腹皆春。」<sup>62</sup>評蔡羽〈川上〉詩，也嘉許其「洵是高杜陵一籌，今人不信耳。」<sup>63</sup>而杜甫「花覆千官淑景移」句，與蔡羽「中庭綠陰徙」相較，「猶其孫子」<sup>64</sup>，明顯可見其對學杜者及杜詩的貶抑傾向。甚至連帶批評杜甫的人品，如謂其「愁貧怯死」<sup>65</sup>或「忠孝之情不逮，乃求助於血勇」<sup>66</sup>等等。

然而，深究其實，王夫之並非完全否定杜詩，否則也就難以解釋其《唐詩評選》選錄杜詩最多的現象。重點在於，學杜詩須有善擇之功，避開其不可學者，而擇其精要處。至於王夫之認為杜詩有哪些是不可學的呢？歸納其詩論內容，可概括為：以詩為史、以議論為詩與詩作近情入俗者。

就以詩為史而論，王夫之《明詩評選》論徐渭詩云：「學杜以為詩史者，乃脫脫《宋史》材耳。杜且不足學，奚況元、白。」<sup>67</sup>《古詩評選》更有「以詩史稱杜陵，定罰而非賞」<sup>68</sup>之言。所以然者，在於「文章之道，自各有宜」<sup>69</sup>，而詩、史各有所長，詩宜於即事生情，即語繪狀；史宜於敘事敘語，從實著筆。詩作若夾雜史法，亦即以詩為史，「則相感不在永言和聲之中，詩道廢矣。」王夫之並舉杜甫〈石壕吏〉為例，謂本詩「每於刻畫處猶以逼寫見真，終覺於史有餘，於詩不足」，因而以「詩史」譽杜，猶如「見駝則恨馬背之不腫」<sup>70</sup>，混淆了詩與史不同體裁的特色。其所

<sup>61</sup> 清·王夫之著，陳新校點：《明詩評選》，卷5，頁194，〈春寒〉後評。

<sup>62</sup> 清·王夫之著，陳新校點：《明詩評選》，卷4，頁134，〈九月十四日集東麓亭〉後評；頁136，〈錢孔周席上話文衡山王履吉金元賓〉後評。

<sup>63</sup> 清·王夫之著，陳新校點：《明詩評選》，卷5，頁200。

<sup>64</sup> 清·王夫之著，陳新校點：《明詩評選》，卷4，頁135，〈早秋李抑之見過〉後評。

<sup>65</sup> 清·王夫之著，陳新校點：《明詩評選》，卷4，頁89，劉基〈感春〉後評。

<sup>66</sup> 清·王夫之著，任慧點校：《唐詩評選》，卷3，頁162，鄭遨〈山居〉三首之三後評。

<sup>67</sup> 清·王夫之著，陳新校點：《明詩評選》，卷2，頁62，〈沈叔子解番刀為贈〉後評。

<sup>68</sup> 清·王夫之著，李中華、李利民校點：《古詩評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卷1，頁24，〈煌煌京洛行〉後評。

<sup>69</sup> 清·王夫之著，任慧點校：《唐詩評選》，卷3，頁125，高適〈自薊北歸〉後評。按：王夫之此處所謂「文章」，由引文之後提及「典冊檄命」、「五言」、「近體」等言，可知「文章」應是泛指各種文類。

<sup>70</sup> 清·王夫之著，李中華、李利民校點：《古詩評選》，卷4，頁139，〈古詩四首〉之一後評。

以嚴辭指責杜甫為「風雅罪魁」，也是針對杜甫決破「詩以道性情」的疆界，將詩作與其他闡揚天德王道、事功節義、禮義文章的文類混雜，導致「桎梏人情，以掩性之光輝」<sup>71</sup>。

對於唐、宋人以議論為詩，王夫之也十分反感，以為「則但一篇陳便宜文字，強令入韻，更不足以感人深念矣。」追根究底，「此法至杜而裂，至學杜者而蕩盡。」<sup>72</sup>其並倡言：「議論入詩，自成背戾。」<sup>73</sup>所以然者，在於「風雅之道，言在而使人自動，則無不動者；恃我動人，亦孰令動之哉？」<sup>74</sup>「通人於詩，不言理而理自至，無所枉而已矣。」<sup>75</sup>換言之，若為真詩，自有真理寓於其中，不必刻意說理。其批評杜詩「水流心不競」、「花鳥自無私」是「以無私之德，橫被花鳥；不競之心，武斷流水」<sup>76</sup>，對自然界的花鳥、流水橫加個人判斷語；而陶潛的「人生歸有道」、「憂道不憂貧」等語，也被歸入「老措大稱賞」<sup>77</sup>之類，因為這類詩句本身便具有說理成分，違反「言在而使人自動」、「不言理而理自至」的原則。

對於杜詩近情入俗的部分，王夫之的反彈更是強烈。在王夫之眼中，杜詩敗筆有「宋人謾罵之祖」者如「李瑱死歧陽，來瑱賜自盡」、「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sup>78</sup>之類；而「自墮塵土」者如「鵝鴨宜長數」、「計拙無衣食」、「老翁難早出」等；另有「裝名理為腔殼」者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或為「擺忠孝為局面」者如「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以上詩句，王夫之不僅視為「門面攤子句，往往取驚俗目」，並認為是杜甫「人品、心術、學問、器量大敗闕處」<sup>79</sup>。但由於這類的詩句多為後世學杜者仿效，連帶的，王夫之在論及「學杜」現象時，往往以鄙薄厭惡的

<sup>71</sup> 清·王夫之著，陳新校點：《明詩評選》，卷5，頁243，徐渭〈嚴先生祠〉後評。

<sup>72</sup> 清·王夫之著，陳新校點：《明詩評選》卷4，頁153，湯顯祖〈南旺分泉〉後評。

<sup>73</sup> 清·王夫之著，李中華、李利民校點：《古詩評選》，卷4，頁178，張載〈招隱〉後評。

<sup>74</sup> 清·王夫之著，李中華、李利民校點：《古詩評選》，卷4，頁165，左思〈詠史四首〉之四後評。

<sup>75</sup> 清·王夫之著，李中華、李利民校點：《古詩評選》，卷4，頁191，陶潛〈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後評。

<sup>76</sup> 清·王夫之著，李中華、李利民校點：《古詩評選》，卷4，頁191，陶潛〈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後評。

<sup>77</sup> 清·王夫之著，李中華、李利民校點：《古詩評選》，卷4，頁191，陶潛〈飲酒二首〉之二後評。

<sup>78</sup> 清·王夫之著，任慧點校：《唐詩評選》，卷2，頁71，杜甫〈後出塞二首〉之二後評。

<sup>79</sup> 清·王夫之著，任慧點校：《唐詩評選》，卷3，頁139，〈漫成〉後評。

語氣出之，如云：

〈七歌〉不紹古響，然唐人亦無及此者。……俗子或喜其近情，便依仿為之，一倍惹厭。大都讀杜詩、學杜者，皆有此病。是以學究幕客，案頭胸中，皆有杜詩一部，向政事堂上，料理饅頭餛子也。<sup>80</sup>

亡友上湘歐陽淑云：「工部詩如『老夫清晨梳白頭』一派，正令人人可詩，人人可杜，宜天下之競言杜也。」競言杜，不復有杜矣。<sup>81</sup>

蒙古之末，楊廉夫（按：元人楊維禎，字廉夫）始以唐體杜學，救宋學之失。……孟載（按：明人楊基，字孟載）依風附之，偏竊杜之垢膩以為芳澤，數行之間，鵝鴨充斥；三首之內，紫米喧闐。沖口市談，滿眉村餽。……嗚呼，詩降而杜，杜降而夔府以後詩，又降而有學杜者，學杜者降而為孟載一流，乃栩栩然曰吾學杜，杜在是，詩在是矣。……操觚者有恥之心焉，姑勿言杜可也。<sup>82</sup>

在「學究幕客，案頭胸中，皆有杜詩一部」、「人人可詩，人人可杜」、「數行之間，鵝鴨充斥；三首之內，紫米喧闐」的泛濫充斥下，宜乎王夫之要發出「競言杜，不復有杜」、「姑勿言杜可也」的反彈。徐國能先生也為文指出：

他（指王夫之）以「含蓄」為詩歌審美的最高原則，故他清楚地認識到杜甫的存在，是「惡紫奪朱」，是「含蓄」詩論無法申張的重要原因，因此不遺餘力地指出杜甫對詩的錯解與後人的誤學。<sup>83</sup>

由「含蓄」詩論的發展角度，說明了王夫之何以對杜詩以及學杜之人有所批評的緣由。

然而，儘管王夫之對當時詩壇「學杜」的現象有所不滿，但在《唐詩評選》中，其對杜詩並非採取「略而不選」或是「少選」的方式作來作反制，而是採取「杜詩入選數量最多」的策略。比較《唐詩評選》選詩數量較高的前五家，杜甫詩選入 91

<sup>80</sup> 清·王夫之著，任慧點校：《唐詩評選》，卷 1，頁 31。

<sup>81</sup> 清·王夫之著，任慧點校：《唐詩評選》，卷 1，頁 31。

<sup>82</sup> 清·王夫之著，陳新校點：《明詩評選》，卷 6，頁 280，楊基〈客中寒食有感〉後評。

<sup>83</sup> 參見氏著：《清代詩論與杜詩批評——以神韻、格調、肌理、性靈為論述中心》（臺北：里仁書局，2009），第二章第一節〈「攻杜」的詩學思想與批評史意義〉，頁 69。

首，在《唐詩評選》中不僅為數最多，還是第二名李白 43 首的 2.1 倍，第三名王維 25 首的 3.6 倍。尤其是七律一體，單是杜甫一家的選錄數量高達 37 首，遠遠超越前四位詩家個位數的入選量（李白 2 首，王維 4 首，岑參 5 首，韋應物 3 首）。再由《唐詩評選》以下對杜詩的評語來看：

表二：王夫之《唐詩評選》對杜詩的評價

| 《唐詩評選》選錄杜詩及相關評語                                           | 出處        |
|-----------------------------------------------------------|-----------|
| 〈哀王孫〉：畫家有工筆、士氣之別，尚處大損士氣。此作亦肖甚，而士氣未損，較「血污遊魂歸不得」一派自高一格。     | 卷 1 頁 29  |
| 〈遣興〉四首之一：結撰不淫，只如此寄哀已足，何用「人少虎狼多」、「痴女飢咬我」、「呻吟更流血」而後為悲哉？     | 卷 2 頁 69  |
| 〈登岳陽樓〉：出峽詩攝汗漫於整暇，不復作「花鳥無私」、「水流不競」等語矣。                     | 卷 3 頁 135 |
| 〈倦夜〉：清適如此，必非指天畫地以學杜人所得。                                   | 卷 3 頁 138 |
| 〈廢畦〉：詠物詩唯此為最。                                             | 卷 3 頁 140 |
| 〈千秋節有感〉：杜於排律極為漫爛，使才使氣，大損神理……今為存其節奏不繁者三數篇，俾庸人有遺珠之歎，於杜乃為不失。 | 卷 3 頁 178 |
| 〈燕子來舟中作〉：學杜者不當問津於此耶？                                      | 卷 4 頁 223 |
| 〈遣興〉四首之二：宛折有神，乃以直承魏、晉上。                                   | 卷 2 頁 70  |
| 〈遣興〉四首之三：觀其風矩，尋其局理，固當文於王粲，章於袁淑，杜陵未敗之筆固有如此。……冥搜所得，乃不著冥搜之容。 | 卷 2 頁 70  |
| 〈遣興〉四首之四：點染處，寓婉於直。                                        | 卷 2 頁 70  |
| 〈無家別〉：〈三別〉皆一直下，唯此尤為平淨。                                    | 卷 2 頁 73  |
| 〈前出塞〉二首之二：雄豪之作，偏於平淨得力。                                    | 卷 2 頁 70  |
| 〈後出塞〉二首之一：養局養法，偏於刻畫至極中得不淫汰。                               | 卷 2 頁 71  |
| 〈贈衛八處士〉：每當近情處即抗引作渾然語，不使泛濫……杜贈送五言能有節者，唯此一律。                | 卷 2 頁 75  |
| 〈成都府〉：俗目或喜其近情，畢竟杜陵落處全不關近情與否，如此詩篇只是一雅。                     | 卷 2 頁 74  |
| 〈野望〉：如此作自是野望絕佳寫景詩……攝興觀群怨於一爐，鍾為風雅之合調。                      | 卷 3 頁 136 |
| 〈船上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深潤秀密，杜出峽詩方是至境。                       | 卷 3 頁 137 |
| 〈野老〉：境語蘊藉，波勢平遠。                                           | 卷 4 頁 216 |
| 〈秋興〉八首之五：無起無轉，無敘無收，平點生色。                                  | 卷 4 頁 219 |
| 〈即事〉：純淨，好節奏。                                              | 卷 4 頁 221 |

上述評語中，如〈哀王孫〉、〈遣興〉四首之一、〈登岳陽樓〉，皆取與杜詩冗贅句或近俗句相較，以凸顯該詩的佳處與特長；而〈倦夜〉、〈廢畦〉、〈千秋節有感〉、〈燕子來舟中作〉等詩，實又具有「如何方是學杜」的指導意義；至於〈遣興〉四首之

二以下諸詩評語，則是直接點明該詩的絕妙至境，歸納各詩評語，多具有平淨、宛折、渾然、蘊藉、自然、合調等特點，與王夫之「以平為貴」的詩論及好以「平」論詩<sup>84</sup>的特點是相通的。

與陸時雍《唐詩鏡》相較，更能顯現王夫之《唐詩評選》選錄杜詩作為學杜者的示範、指導之意。如前所述，杜詩在《唐詩鏡》中，兼具有合乎中和之則的正面評論，與有過求之嫌的負面評價，反觀王夫之《唐詩評選》對杜詩的評論，除了少部分詩作略帶貶意，如謂〈新婚別〉與〈垂老別〉盡有可刪者，但觀〈新婚別〉後評：「若此種詩，於己無病，要不能為人作藥。」〈垂老別〉後評為：「『勢異鄴城下』是反形語，揜打自含風人之旨。」<sup>85</sup>與《明詩評選》中「競言杜，不復有杜」、「姑勿言杜可也」的譏諷反彈實不可同日而語。而〈後出塞〉二首之二，雖是「直刺牛仙客、安祿山」，但也指出本詩「乃唯照耀生色，斯以動情起意」，有別於「直刺而無照耀，為訟為詛而已」的敗筆之作。至於〈旅夜書懷〉、〈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為面別情見乎詩〉、〈詠懷古跡〉二首之二，雖然詩中利鈍兼具，有「不得不留之」<sup>86</sup>的遺憾，但王夫之畢竟是「留之」而非直接刪去，可見這些詩作仍有可取之處，而詩中利鈍互見的評語，也有別於陸時雍對杜詩有過求之嫌者，直接刪去或予以負評的作法。

此外，陸時雍《唐詩鏡》在杜甫詩卷中推尊李白，以致「喧賓奪主、賓主易位」

<sup>84</sup> 「以平為貴」之說，王夫之《唐詩評選》論趙嘏〈九日陪越州元相宴龜山寺〉云：「鍾嶸言詩以平為貴，如此亦無崎嶇嶮峻之態。」見氏著，任慧點校：《唐詩評選》，卷4，頁258。至於王夫之好以「平」論詩的內容，詳細可參見涂波：〈說平——王夫之詩學批評中的重要概念〉，《船山學刊》1（2006），頁11-14。任慧：〈王夫之《唐詩評選》的選詩標準及評點方法〉，《文獻季刊》2（2009），頁133-138。

<sup>85</sup> 兩詩評語分見清·王夫之著，任慧點校：《唐詩評選》，卷2，頁72、73。

<sup>86</sup> 王夫之謂〈旅夜書懷〉「星隨平野闊，月湧大江流」二句「一空萬古」，「名豈文章著」也「自是好句」，但詩作後四語有「脫氣」之嫌，末句「天地一沙鷗」也「大言無實」，故而有不得不留之憾。見氏著，任慧點校：《唐詩評選》，卷3，頁138。〈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為面別情見乎詩〉一詩，雖後半「走筆以極悲態」，易於取佞口耳，但前半「樗散」、「酒」、「老畫師」等語，皆有微言大意，「中興時」三字則有代之悔意，王夫之故云「所以貴有詩者以此」。見氏著，任慧點校：《唐詩評選》，卷4，頁212。〈詠懷古跡〉二首之二，首句「群山萬壑赴荆門」施之於「生長明妃尚有村」，在王夫之眼中，雖有「佛頭加冠」之失，但整體而言，本詩實又有「以現成意思，往往點染飛動」、「平收不作論贊」的優點。見氏著，任慧點校：《唐詩評選》，卷4，頁221。

的作法，王夫之也與之有異。如王夫之《明詩評選》曾言「於唐詩深惡李頎」<sup>87</sup>，《唐詩評選》僅選錄李頎五古一首，但觀其所附評語為：「頎集絕技，骨脉自相均適。」<sup>88</sup>顯然有意以此取代李頎所為人稱道的「七律」。<sup>89</sup>至於白居易與元稹詩作，《唐詩評選》也僅錄兩家七律 3 首，迥異於元、白兩家佔陸時雍《唐詩鏡》選詩量前三、四名的情況；所選的詩目分別是白居易〈錢塘湖春行〉、〈杭州春望〉及〈酬李二十侍郎〉共 3 首，與元稹〈早春尋李校書〉1 首，也遠非元、白稱世的「長慶體」之作。觀其所評白詩〈杭州春望〉：「韻度自非老嫗所省，世人莫浪云『元輕白俗』。」與評元稹〈早春尋李校書〉云：「必欲抹此以輕艷，則《三百篇》之可刪者多矣。但不犯梁家宮體，願皋比先生勿易由言也。」<sup>90</sup>同樣寓有「如何才是元、白真詩」之意，足以印證王夫之《唐詩評選》選錄各家詩，實具有正面呈現各家詩作特色的作用。

要之，儘管王夫之在《古詩評選》、《明詩評選》中對杜詩與學杜的現象多所訾議，但由《唐詩評選》對杜詩選評內容來看，《唐詩評選》選杜最多，乃基於「如何才是杜詩本色」、「學杜者當問津於何種杜詩」的指導立場。儘管《唐詩評選》對李白只褒不貶，對王維也大力推崇<sup>91</sup>，對杜詩則頗多微詞，但既然是針對明代詩壇「學杜」之弊而發，王夫之在《唐詩評選》中自然要選杜最多，此所以選本中的杜詩總數是李詩的兩倍以上甚至遠邁於李白、王維諸家了。

<sup>87</sup> 清·王夫之著，陳新校點：《明詩評選》，卷 5，頁 192，林鴻〈塞上逢故人〉後評。

<sup>88</sup> 清·王夫之著，任慧點校：《唐詩評選》，卷 1，頁 20，李頎〈送陳章甫〉後評。

<sup>89</sup> 李頎「七律」一體為明人推崇的情形，詳細可參見陳國球：《明代復古派唐詩論研究》，第二章第四節「李頎問題」，頁 95-100。

<sup>90</sup> 清·王夫之著，任慧點校：《唐詩評選》，卷 4，頁 246-248。

<sup>91</sup> 清·王夫之著，任慧點校：《唐詩評選》，卷 4，頁 246-248。王夫之評王維五律〈送梓州李使君〉，有「右丞工用意，尤工於達意。景亦意，事亦意，前無古人，後無嗣者。文外獨絕，不許有兩」的高度評價。見氏著，任慧點校：《唐詩評選》，卷 3，頁 122。評〈使至塞上〉詩，亦有「用景寫意，景顯意微，作者之極致也」之言。見氏著，任慧點校：《唐詩評選》，卷 3，頁 120。評七律〈奉和聖制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應制〉，也譽之為「人工備絕，更千萬人不可廢」。見氏著，任慧點校：《唐詩評選》，卷 4，頁 202。從中俱可見王夫之對王維推崇之意。

## 五、陸時雍與王夫之選杜的共同樣貌

如前所論，陸時雍《唐詩鏡》與王夫之《唐詩評選》選錄杜詩最多的緣由雖然有別，但深究兩家選評杜詩要點，陸時雍批評杜詩過求高大好奇者，而以合乎「中和之則」者為尚，王夫之則訾議杜詩以史為詩、好議論、好俗入情者，轉而以平淨宛折、渾然蘊藉、自然合調者為學杜的典範，兩者的選詩標準實有異曲同工之妙。由於王夫之《唐詩評選》選錄 91 首杜詩中，有 52 首與陸時雍《唐詩鏡》選杜重疊，以下擬透過這些交集的詩題，呈現出兩家選杜的共同樣貌。

### 樂府歌行，共 11 首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哀王孫〉、〈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麗人行〉、〈閬水歌〉

### 五言古詩，共 10 首

〈前出塞〉（單于寇我壘）、〈後出塞〉（朝進東門營）、〈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石壕吏〉、〈成都府〉、〈贈衛八處士〉、〈次晚洲〉、〈赤谷〉

### 五言律詩，共 7 首

〈春宿左省〉、〈晚出左掖〉、〈野望〉（清秋望不極）、〈禹廟〉、〈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漫成〉（江皋已仲春）、〈夜宴左氏莊〉

### 五言排律，共 3 首

〈重經昭陵〉、〈千秋節有感〉、〈春歸〉

### 七言律詩，共 21 首

〈題張氏隱居〉、〈鄭駙馬宴洞中〉、〈城西陂汎舟〉、〈贈田九判官梁丘〉、〈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為面別情見於詩〉、〈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紫宸殿退朝口號〉、〈題省中院壁〉、〈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曲江二首〉、〈曲江對酒〉、〈曲江值雨〉、〈九日藍王宴崔氏莊〉、〈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竹寒沙碧浣花溪）、〈夜〉、〈見螢火〉、〈即事〉、〈小寒食舟中作〉、〈燕子來舟中作〉

單獨就以上詩作選目來看，或許難以看出所以然，但如果取代表明代復古詩論的李

攀龍（1514-1570）《古今詩刪》之「唐詩選」選杜部分，與盛行於晚明詩壇，由鍾惺（1574-1625）、譚元春（1586-1637）共同編選，「承學之士，家置一編，奉之如尼丘之刪定」<sup>92</sup>的《唐詩歸》<sup>93</sup>，以及明清之際錢謙益（1582-1664）藉由鉤稽考核史事以闡明杜詩內涵的《錢注杜詩》內容相較，當不難看出陸、王兩家選杜的特色。

以杜甫七律而言，陸時雍與王夫之的唐詩選本所選杜甫七律，在所有詩體中領先唐代詩家的幅度最大，且王夫之所選的 37 首七律，與陸時雍選目重複者有 21 首，重複率將近六成，足見兩家對杜甫七律的看法有高度交集。但取陸、王兩家選杜七律內容，與李攀龍《古今詩刪》之「唐詩選」所選杜甫 13 首七律<sup>94</sup>相較，三家共同交集的僅有〈題張氏隱居〉及〈九日藍田崔氏莊〉兩首。再就李攀龍與陸時雍對杜甫七律選目交集者觀之，〈登樓〉詩次聯「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陸時雍謂其「空頭且帶俚氣」<sup>95</sup>；〈九日登高〉之「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陸時雍也認為「無邊、不盡」及「落、下」皆有語意重複之嫌<sup>96</sup>；而〈閨夜〉與〈秋興〉八首，前者因「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一聯「意盡無餘」<sup>97</sup>，後者因「語氣鄭重，非其至佳之作」<sup>98</sup>，都被陸時雍打入七律卷末附錄之列，可見陸時雍所選錄的杜甫七律，明顯異於李攀龍所賞好的雄渾壯闊的格調。至於李攀龍與王夫之選杜甫七律交集者，除三家共同交集的〈題張氏隱居〉與〈九日藍田崔氏莊〉兩首外，另有〈九日登高〉及〈秋興〉。王夫之對〈秋興〉八首全數選錄，並云：「八首正如正變七音旋相為宮，而自成一章。或為割裂，則神體盡失矣。選詩者之賊不

<sup>92</sup>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臺北：明文書局，1991），丁集·中〈鍾提學惺〉，頁 610。

<sup>93</sup> 可參見明·鍾惺、譚元春合選：《唐詩歸》，《四庫全書存目》集部第 338 冊（臺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

<sup>94</sup> 李攀龍《古今詩刪》之「唐詩選」所選杜七律 13 首，分別為〈題張氏隱居〉、〈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九日藍田崔氏莊〉、〈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野望〉（西山白雪三城戍）、〈登樓〉、〈秋興〉三首（玉露凋傷楓樹林、蓬萊宮闕對南山、昆明池水漢時功）、〈吹笛〉、〈閨夜〉、〈返照〉、〈九日登高〉。詳見明·李攀龍：《古今詩刪》，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587 冊，卷 17，頁 4-7。

<sup>95</sup> 明·陸時雍：《唐詩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637 冊，卷 26，頁 13。

<sup>96</sup> 原評內容為「三、四是愁緒語。無邊、不盡，語贅；落、下，多一字。」參見明·陸時雍：《唐詩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637 冊，卷 26，頁 20。

<sup>97</sup> 明·陸時雍：《唐詩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637 冊，卷 26，頁 22。

<sup>98</sup> 明·陸時雍：《唐詩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637 冊，卷 26，頁 23。

小。」<sup>99</sup>相形之下，李攀龍僅選錄〈秋興〉三首，正是王夫之所訾議的「選詩之賊」；且王夫之所評定「八首中此作最為佳境」的「昆吾御宿自逶迤」一首，也不在李攀龍所選錄的三首之列，顯見李攀龍與王夫之對杜甫七律的看法是頗有差異的。

至於鍾惺、譚元春評選杜詩，好於家常瑣細與詠物小題中，闡發杜詩的大道理、大學問，所以對〈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為新句〉、〈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小寒食舟中作〉、〈將別巫峽贈南卿兄襄西果園四十畝〉、〈信行遠修水筒〉、〈催宗文樹雞柵〉等家常瑣細詩，可謂眷眷注目、細細關心。但以上諸詩，除〈小寒食舟中作〉之外，陸、王兩家都未選入。至於鍾、譚所津津樂道「最靈最奧、有神有味」的詠物小詩，如〈苦竹〉、〈蒹葭〉、〈螢火〉、〈歸雁〉、〈猿〉、〈白小〉、〈鸚鵡〉、〈孤雁〉、〈房兵曹胡馬〉、〈病馬〉、〈促織〉、〈斃〉、〈雞〉等詩，陸、王兩家也並未加以著墨，可見兩家異於鍾、譚《唐詩歸》瑣細好奇的選詩傾向。

錢謙益《錢注杜詩》<sup>100</sup>的特色，在於引史證詩、詩史互證的箋注方式，於人所不能注者，一一注出，所發皆不愧為精闢之史論。其所致力闡釋、大書特書的杜詩，主要為興哀於馬嵬之事，專為貴妃而作之〈哀江頭〉；記載安史之亂，王孫落難泣於路隅的〈哀王孫〉；刺肅宗不能盡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賢臣，以致太平之〈洗兵馬〉；婉諷李氏王朝以宗廟之禮奉祀老子，卻未必能知道德之意的〈冬日洛城謁玄元皇帝廟〉；於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河北歸順諸將，題曰「歡喜」，實恫乎有餘悲之〈承聞河北諸道節度使入朝歡喜口號絕句〉；刺代宗信任宦官程元振，解郭子儀兵權，遂招致匈奴之禍，不復開元盛況的〈憶昔〉，以及逐首箋釋、闡明詩作意旨及章法連貫的〈諸將〉五首與〈秋興〉八首。然而，上述具有詩史特色的杜詩，除〈哀王孫〉外，其他都未出現在陸、王兩家共同選錄的詩目當中。檢視〈哀王孫〉被陸、王兩家選評的重點，在於敘事簡要不煩<sup>101</sup>，並不在於「以詩為史」的意義與價值，益可

<sup>99</sup> 清·王夫之著，任慧點校：《唐詩評選》，卷4，頁218。

<sup>100</sup> 清·錢謙益箋注：《杜工部集》，《續修四庫全書》130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25-321。  
按：《錢注杜詩》雖非杜詩選本，但錢氏僅擇其所認為重要的詩作，於詩後附「箋曰」以闡釋詩意，而非如仇兆鰲《杜詩詳註》首首皆有箋釋。

<sup>101</sup> 陸時雍評〈哀王孫〉云：「一起借徑，省敘事之煩。〈哀王孫〉、〈哀江頭〉去繁就簡，語歸至要。」見氏著：《唐詩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637冊，卷25，頁7。王夫之謂〈哀王孫〉雖

知陸、王兩家所選的杜詩，不同於錢謙益以「詩史」為重的特色。

要而言之，陸、王兩家以「中和之則」及「以平為貴」為論詩要點，所選的七律多為朝會、宴飲、贈別或即事所感之作，企圖在黜落「高大好奇」之後，呈現出「蘊藉平和」的面貌，自然有別於李攀龍所選的「雄闊高渾，實大聲弘」的「杜樣」<sup>102</sup>七律，也迥異於鍾、譚《唐詩歸》所偏好的家常瑣細與詠物小詩，至於「以詩為史」或好發議論的詩作，更是有違陸、王兩家的詩論要旨，宜乎不受兩家青睞了。

## 六、結論

本文針對陸時雍與王夫之兩家「貶杜」與「尊杜」之間的矛盾現象進行爬梳，期能對兩家的詩論及所選出的杜詩樣貌，有更周全的觀照與思考。尤其是兩家的唐詩選本中「選杜最多」背後的深意，從而得出：陸時雍選杜最多，實有取杜詩作為其「中和之則」詩論的正、反例證；而王夫之選杜最多，則具有「如何才是真杜詩」、「如何才能真學杜」的指導意義。

此外，本文藉由陸時雍與王夫之所追求的「中和之則」與「以平為貴」的詩論，檢視兩家唐詩選本所選的杜詩，以見兩家以「平美」取代「奇美」<sup>103</sup>，有別於李攀龍、鍾惺及譚元春、錢謙益等人所選的杜詩樣貌。然而，陸、王兩家藉由選、評杜詩，呈現出杜詩「平美」的特點，這與晚明文學思潮之間，究竟是一種悖離或結合關係？而王夫之積極抗清與陸時雍終身不仕的個人背景，對於杜詩的選評又造成何種程度的影響？後世讀者對於杜詩「平美」特點的接受情況又是如何？這些都是本文可據以延伸探討的問題，但由於上述議題需給合明、清詩學思想的發展，選本所造成的影響部分，又涉及明、清對杜詩接受觀念的轉變，篇幅所限，希望日後能結

逼尚，但士氣未損，較「血污遊魂歸不得」一派，自高一格，應是指本詩內容未過於徑直無餘，詳見清·氏著，任慧點校：《唐詩評選》，卷4，頁29。

<sup>102</sup> 語見錢鍾書：《談藝錄》（北京：中華書局，1993），卷51，頁172。

<sup>103</sup> 將杜詩概分為「平美」與「奇美」兩大類，參見鄒國平、葉佳聲：〈王夫之評杜甫論〉，頁61。

合相關議題，再就以上問題作更深入而完整的論述。

## 引用書目

### 一、原典文獻

明・李攀龍：《古今詩刪》，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58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明・陸時雍：《古詩鏡・詩鏡總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63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明・鍾惺、譚元春合選：《唐詩歸》，《四庫全書存目》集部第 338 冊，臺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臺北：明文書局，1991。

清・錢謙益箋注：《杜工部集》，《續修四庫全書》130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 25-321。

清・王夫之著，陳新校點：《明詩評選》，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

清・王夫之著，李中華、李利民校點：《古詩評選》，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

清・王夫之著，任慧點校：《唐詩評選》，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8。

清・紀昀等著：《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二、近人論著（以姓氏筆劃排列）

任慧：〈王夫之《唐詩評選》的選詩標準及評點方法〉，《文獻季刊》2（2009），頁 133-138。

涂波：〈說平——王夫之詩學批評中的重要概念〉，《船山學刊》1（2006），頁 11-14。

涂波：〈論王夫之選本批評〉，《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38：4（2005.07），頁 50-55。

郭瑞林：〈千古少有的偏見——王夫之眼中的杜甫其人其詩〉，《湘潭師範學院學報》21：4（2000.07），頁 82-87。

徐國能：《清代詩論與杜詩批評——以神韻、格調、肌理、性靈為論述中心》，臺北：里仁書局，2009。

陳國球：《明代復古詩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鄔國平、葉佳聲：〈王夫之評杜甫論〉，《杜甫研究學刊》1（2001），頁 55-65。

錢鍾書：《談藝錄》，北京：中華書局，1993。

羅安伶：《陸時雍〈唐詩鏡〉之詩學理論研究》，臺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